



中国与国际体系 进程与实践

Practices of Engagement: Processes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朱立群等◎著

中国与国际体系 进程与实践

Practices of Engagement: Processes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朱立群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 / 朱立群等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12-4277-1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4675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马莉娜
田 林

书 名

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

Zhongguo Yu Guoji Tixi: Jincheng Yu Shijian

作 者

朱立群等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毫米 1/16 22¼印张

字 数

36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277-1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朱立群^①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参与全球互动和集体决策，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维护全球秩序。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中国不仅全面卷入全球市场，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制度。据统计，到2007年，在全球61836个国际组织中，中国共参与了4386个国际组织，其中参与的1753个是协定性组织。从纵向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参与率迅速提升，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履约表现受到广泛肯定。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被动、消极、抵触到之后的积极、主动、融入，并在参与中不断创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国际身份从体系的反对者、游离者，变成了一个融入者。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可信赖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②

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这种变化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密切相关，它

^① 朱立群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② 温家宝：《开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和谐的新局面：在中欧论坛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2006年9月13日），载《国务院公报》2006年第32期，第5—6页。

是中国实行和平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没有像传统的崛起大国那样通过武力扩张挑战现有秩序，而是更多地利用现有秩序中的制度渠道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也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没有像日本那样满足于美国治下的从属地位。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不仅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也在经验层面成为一个相对特殊的案例，值得深入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近些年来涌现出大量基础深厚的学术成果，它们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面提供了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动力、程度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解释。本书在第一章理论研究框架部分对这些研究从理论分类的角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它们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西方现有三大体系理论难以清楚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进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快速融入的动态过程，现有三大主流理论，不管是理性主义以物质结构还是社会建构主义以观念结构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静态的。从物质结构出发的现实主义，观察中国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上，在这个方面的任何进展都会带来“中国威胁论”的兴起。以观念结构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则更多地看到的是中西观念的结构性差异，看不到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总体合作发展的态势。因此，西方静态的结构主义理论难以清楚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需要引入新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

其次，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远比西方理论模式更丰富和更复杂。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内部就存在着各种不平衡，这种复杂性必然反映到中国的对外关系进程中。由于国际体系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进入快速变化时期，因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也必然是复杂的，不同领域的参与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实践远比理论丰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远远超出了根据西方经验发展出来的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

最后，中国参与国家体系的实践结果很难用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

国家的二分法来描述。中国从1979年以后愈来愈融入国际制度，愈来愈与国际制度认同，而不是挑战和试图改变国际制度体系。中国积极融入的国际合作战略，对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因此，很难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或者说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现有解释模式显然因为陷入了西方中心论和二元对立思维困境中，而难以清楚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与此同时，也需要警惕另外一种二元对立，那就是将西方化与本土化对立起来，将学术研究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情感化，这种二元对立同样不能提供理性的、符合实际的解释。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以“参与实践”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解释框架。我们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需要从我们的自身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期出发。我们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个参与实践不仅受到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的影响，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认知（即新剧本），并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得国际体系的承认，形成新的身份。同时，中国在系统履约和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中，通过反思和创新，在积极的沟通与合作中，创造影响和变革国际体系的时空条件，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由此，我们在“参与实践”与“身份重塑”和“秩序变革”之间建立起一个因果作用机制，参与实践是自变量，身份重塑是因变量。获得国际制度不同程度的承认，也就是获得了不同的新身份，体现出不同的参与程度。这样，参与实践与身份重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实践者以新的身份重新投入实践，开始新一轮的实践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正是体现了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持续参与历程。

在以“参与实践”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导下，我们选择了国际体系中的11个国际制度领域进行案例分析，希望能够通过深入参与实践过程发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实践特点及其意义。我们系统讨论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G20、与联合国、与国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中国

参与气候变化机制、核不扩散机制、维和机制、小武器和地雷控制机制等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清楚梳理和分析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现状、程度及其背后的核心动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总结中国30年参与国际体系的经验教训，发现规律，为中国今后30年的进一步深化参与国际体系提供有益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同时，在学理意义上，我们也希望通过本研究创新理论，在总结中国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我们认为，任何理论和社会意义结构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着实践。理论创新之路，在于走向具体实践。

目前，国际体系正面临新一轮调整，中国处于深入参与国际体系的重大机遇期，如何使国际体系的调整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是我国面临的核心战略任务。随着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日益密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并没有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而消解，反而担忧甚至敌意增加，如何深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破解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的课题。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正处于国内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内部平衡发展压力增大，各种问题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关联度提高，如何在参与国际体系过程中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和坚持内外和谐发展，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研究，提出更具解释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是一个集体成果，集中了项目组各位参与者和项目组专家的智慧 and 思想。项目的具体分工如下：朱立群负责项目的总体结构和分析框架设计，全书修订统稿，并撰写了前言、第1章和结论部分；卢静，第2章；曲博，第3章；朱杰进，第4章；高尚涛，第5章；冯继承，第6章；高望来，第7章；黄超，第8章；林民旺，第9章；吴文成，第10章；张爱宁，第11章；李海东，第12章。卢静担任项目组的协调管理工作，承办了项目执行过程中召开的各次会议，并在该书出版前校对了全书。在此，对她的辛苦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的项目，受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资助。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研究基地的重点建设方向，本研究属于该基地的一项基础研究，也是重点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大力支持。同时，项目聘请了秦亚青、周启朋、王帆、李少军、袁正清等专家学者作为项目组的专家，他们对项目的设计、内容以及撰写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对有关方面以及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袁路明编辑和其他编校人员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精心设计和认真编辑，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和发行。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研究框架：参与实践与身份重塑	1
一、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文献梳理	3
二、以“参与实践”为核心概念的分析	8
三、实践环境、资源与“新剧本”	16
四、身份重塑：参与实践的结果	24
第2章 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践进程	28
一、凝聚共识、积极备战：中国入世前的准备	29
二、利益博弈、艰苦谈判：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程	41
三、从学习者到作为者：中国入世后的身份变化	53
四、结语	63
第3章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进程分析	67
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利益、社会化还是实践	68
二、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2
三、中国与世界银行	77
四、结语	81

第4章 中国参与G20反恐融资体系的实践.....	83
一、反恐融资国际机制：联合国与G20.....	84
二、中国参与G20反恐融资体系：履约的实践.....	88
三、体系环境、国内资源与中国的参与实践：制度互动的视角.....	91
四、结语.....	97
第5章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实践进程.....	98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联合国偏好及其实践分析.....	99
二、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实践进程分析.....	105
三、反殖民化背景下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实践进程分析.....	109
四、结语.....	117
第6章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	119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进历程.....	121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话语实践.....	127
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	136
四、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关系的演进.....	144
五、结语.....	146
第7章 中国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机制的实践进程.....	149
一、中国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机制的实践.....	150
二、在军控机制外的游离时期（1949—1979年）.....	155
三、有限参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实践（1979—1992年）.....	159
四、全面参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实践（1992—2000年）.....	165
五、开放性参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实践（2000— ）.....	171
六、结语.....	180
第8章 中国参与地雷和轻小武器国际控制机制的实践.....	182
一、中国参与地雷国际控制机制.....	183

二、中国与轻小武器国际控制机制	193
三、结语	205
第9章 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分析	208
一、实践视角下的身份焦虑	209
二、为形式承认而斗争（1949—1978年）	214
三、分配承认与价值承认（1978—2003年）：身份焦虑的消减	219
四、创新实践的开端（2003— ）：新的身份焦虑	223
五、结语	227
第10章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	229
一、社会化过程中的联盟实践	230
二、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演变	233
三、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内部的联盟实践	236
四、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联盟行为	241
五、联盟实践与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中的“身份承认”	246
六、结语	252
第11章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实践进程	254
一、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实践现状	255
二、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实践的必要性：话语实践	265
三、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互动实践： 生成新剧本	272
四、尊重、保障和实现人权：中国的“履约实践”	280
五、中国对国际人权制度的贡献：创新实践	286
六、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实践：身份的转化	290
七、结语	293

第12章 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 295

 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实践..... 296

 二、中国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学习实践..... 304

 三、结语..... 313

结论 实践逻辑与中国参与的特点..... 315

 一、参与实践与双向社会化..... 316

 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实践的特征..... 325

 三、总结与展望..... 340

第1章

研究框架：参与实践与身份重塑

朱立群

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中国不仅全面卷入全球市场，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制度。据统计，到2007年，在全球61836个国际组织中，中国共参与了4386个国际组织，其中参与的1753个是协定性组织。^①从纵向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参与率迅速提升，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履约表现受到广泛肯定。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被动、消极、抵触到之后的积极、主动、融入，从相对较多的军事参与到越来越强调外交参与，从经济参与发展到全面参与，从双边参与走向多边参与，^②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应该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渐进性、阶段性、不平衡性，还表现出持续学习、不断创新的特征。它是一个未完成时态，不同时间表现出不同的参与重点和特性。

① 朱立群、黄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第195页。

② 潘忠歧：《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基于意向差距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52页。

换句话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还远未结束，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始终面临着参与国际体系带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它具体表现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带给中国怎样的身份变化？为什么在国际体系的不同领域中国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中国的参与是否对国际体系的进步和稳定做出了创新性贡献？所有这些都需要从理论和政策行为两个方面加以解释和说明。

本章将为全书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便我们的研究始终在一个统一连贯的、富有逻辑性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首先梳理现有文献，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上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为寻求更好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讨论“参与实践”和“新剧本”这两个概念；最后，我们围绕着“参与实践”、“新剧本”和“身份承认”，发展出一个分析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指导后续各章的案例研究。

本书的总体研究框架是：我们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个参与实践不仅受到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的影响，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认知（即新剧本），并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得国际体系的承认，形成新的身份。在本项研究中，参与实践的主体是中国政府，时间范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以全球层面为主）的实践活动。出于分析的便利，我们将国际体系区分为国际经济体系、国际政治安全体系以及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三个领域。把参与实践划分为五个类别的实践活动，分别是话语实践、联盟实践、学习实践、履约实践和创新实践。每一类参与实践都可能产生新的认知空间，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新知识，推动参与实践向前发展，并促进参与进程中的创新。参与实践不仅意味着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重新界定，也意味着中国自我身份的转换。国际体系对中国国际地位和身份的三种承认形式（形式承认、实质性承认和主体价值承认），就是参与实践的结果，也体现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同程度。在本研究中，参与实践是自变量，身份承认是因变量。获得国际制度不同程度的承认，也就是获得了不同的新身份，体现出不同的参与程

度。这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实践者以新的身份重新投入实践，开始新一轮的实践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正是体现了这样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实践历程。

一、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文献梳理

不可否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带动了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评价。^① 随着“中国模式”备受瞩目，^② 国外学界对中国的认知评价却更趋分歧，欧美学者越来越强烈地关注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未来走向问题。《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于2007年出版了《中国幻想》一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书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严重的幻想成分，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路径都存在问题，因而导致了不成功的政策结果：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发生西方希望看到的政治改革进程。^③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西方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模式的成功使中国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和西方平等竞争，同时，中国模式也提供了一条替代西方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④ 在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保守人士看来，中国模式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对西方构成了威胁。^⑤ 中国模式越是成功，这种威胁就越大，对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就越是

① 蔡拓：《全球化观念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改革开放30年的外交哲学审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② 关于欧美媒体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唐晓：《欧美媒体对于“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37—52页。

③ 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London: Penguin, 2007.

④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Report of the CSIS Smart Power Initiative, http://www.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90305_mcgiffert_chinesesoftpower_web.pdf. 2010年10月27日访问。

⑤ David Brooks, “The Larger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June 14th, 2010.

构成严峻挑战。^①

可以说，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深度卷入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国际体系，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激起了西方某些人士对自身地位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疑惑，关于中国能否和平发展，中国与国际体系能否建立一个积极合作与和平的关系，依然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提出：中国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能够朝着西方预期的方向发展？中国是否正在对西方构成强烈的冲击和威胁？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对于上述问题，不同的理论流派提供的是不同的解释。现实主义学者如米尔斯海默认为，凡是崛起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必然挑战国际体系。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崛起的中国不可能满足于维持现状。^② 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处在权力转移中的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最容易因崛起国家对自身地位的不满而走向战争，^③ 而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全球领导地位、对现状不满的潜在挑战国。^④

英国学派则认为新兴国家融入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扩展的结果。国际社会从先锋国家（vanguards）的欧洲向其他区域、再向全球不断扩展，欧洲以外的国家只有适应和接受核心体系的规范才能成为被社会化的行为体。^⑤ 从英国学派的理论出发，中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国际体系内一个改革型的修正主义国家，一方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另一

① James Mann, "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Washington Post*, May 20, 20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5/18/AR2007051801640.html>. 2010年10月27日访问。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晓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0页；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105, No.690, April 2006, pp.160-162.

③ A.F.K.Organski & Jacek kUgler,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22-27.

④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2003, p.316.

⑤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22-227; Barry Buza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6, No.1, 2010, pp. 1-25.

方面拒绝接受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制度规范，因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的未来发展仍然是极其不确定的。^①

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国际社会的规范可通过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各种施动者的积极传播、教授和推广而扩展到整个国际社会，^② 新兴国家行为体遵守和内化国际规范是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研究，更多地通过考察国际制度规范的遵守情况来判断中国是否是国际体系内维护现状的国家。通过研究，他们认为，中国这个被历来认为“最不可能履约”（the least-likely）的国家，实际上在履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相比，中国接受以及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③ 因此，中国至少目前更像一个国际体系的现状国。^④ 上述体系层面的主流理论，集中纠缠在中国是挑战国还是现状国的问题上，它们各自依据不同的逻辑和理论预期，给出的是完全不同的解释。

也有很多学者从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视角考察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是章百家提出的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他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

① Barry Buza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6, No.1, 2010, pp. 1-25.

② 关于国际规范传播研究的总结，参见黄超：《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国际规范传播》，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第55—62页。

③ Ann Kent,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2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96。江忆恩研究了中国从1980—2000年间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进程，认为中国在单极时代没有强制性外来压力和回报的情况下，主动参与国际机制，表明中国对国际制度采取了更加合作和更趋自我约束的政策。

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2003, pp.5-5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 197; 安·肯特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履约行为，但认为中国在社会整体层面的履约行为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国际人权领域的履约还有较大的抵触。她因此而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选择性的，中国履约完全出于自身利益，是功利主义的，因而她将中国称为“准革命性国家”。见 Ann Kent,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 pp.242-243。